

庄子之“与天和”

廖同真

“‘和’是标志天、地、人的和协（谐）状态及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的哲学范畴。”¹它为先秦各家学派所共有，并因学派思想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。儒家之“和”，既是儒家人格政治的理想，又是儒家的方法论，突出对仁义的崇尚以及对伦理秩序的遵守。道家庄子哲学以自然之“道”为核心，注重个体的精神自由，在“和”方面则侧重于自然性、内在性、主体性的“与天和”。“与天和”是庄子之“和”的本质，是庄子“与人和”之基础，即协调人自身、人与人关系的基础，是人的自由。

“和”之本质

庄子所言之“和”有多个方面，有时令方面的“寒暑之和”，政治方面的“君臣之和”，人伦方面的“夫妻之和”等，它们是“和”之本质在不同情况下的具体表现。对庄子“和”之本质的探寻，是把握其“和”的根本，也是论述其“和”的应有之义。庄子曰：“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，此之谓大本大宗，与天和者也。所以均调天下，与人和者也。与人和者，谓之人乐；与天和者，谓之天乐。”²“与天和”是“明白于天地

之德者”，是“大本大宗”，即庄子让“与天和”位于事物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地位。从人的生存的角度来讲，“与天和”是人生存的最高指引；从“和”本身来讲，“与天和”则是庄子之“和”的本质。同时，“与天和”为“明白于天地之德者”，这说明了“与天和”与“德”的密切关系，“德”是人合于“道”的状态，它突出对“命”的安顺，对世俗之德的抗拒。在《庄子》中，二者的内涵是互通的，庄子将“和”之本质与“德”联系起来，表现了其“和”的主体性、内在性及其自然性。

“与人和”之基础

庄子曰：“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，此之谓大本大宗，与天和者也。所以均调天下，与人和者也。”“与人和”从“与天和”则“均调天下”而来，这表明“与天和”是“与人和”的基础。同时，“与人和”从范围上是“均调天下”，那么它就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“均调”，还涉及到人与自身之间的“均调”。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来说明“与天和”对“与人和”的基础作用。

（一）从人与自身之间的“均调”来看

“与天和”是人养生的条件之一。首先，它体现



在人如果能“与天和”，其生时之“和气”就旺盛，“和气”旺盛则生命长寿。庄子曰：“老子曰：卫生之经，能抱一乎？能勿失乎？能无卜筮而知吉凶乎？能止乎？能已乎？能舍诸人而求诸己乎？能攸然乎？能侗然乎？能儿子乎？儿子终日嗥而嗑不嘎，和之至也；终日握而手不脱，共其德也，终日视而目不瞑，偏不在外也。行不知所之，居不知所为，与物委蛇而不同其波。是卫生之经已。”³能像婴儿一样“和之至”，是“卫生”的表现，而“卫生之经”是“行不知所之，居不知所为，与物委蛇而不同其波”，本质上就是“与天和”。因为“与天和”有“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。静而与阴同德，动而与阳同波”的特质。换句话说，“与天和”能够使人保持“和”之至，故其能使人长寿。其次，它表现在人如能“与天和”，则能守住生命之根本，以此则能守形壮身。庄子曰：“我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，至彼至阳之原也，为汝入于窈冥之门矣，至彼至阴之原也。天地有官，阴阳有藏，慎守汝身，物将自壮。我守其一以处其和，故我修身千二百岁矣，吾形未尝衰。”⁴“一”即“道”，是生命的根本，此处，“守一以处其和”是心灵契入“道”境，即“游心于道”的状态，即“德”，也即“与天和”。“与天和”守住了生命的根本，故使得“吾形未尝衰”。

（二）从人与人之间的“均调”来看

首先，“与天和”是人与人相处的原则。“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，无誉无訾，一龙一蛇，与时俱化，而无肯专为。一上一下，以和为量，浮游乎万物之祖。”⁵“和”在此处是“乘道德而浮游”，是“与天和”。“一上一下，以和为量”，是指人之行事需以“与天和”为原则。《人间世》篇，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，面对“其德天杀”的灵公太子，颜阖进退两难，遂问于蘧伯玉，庄子借蘧伯玉之口给出的建议是：“和不欲出。”“和不欲出”表现为心不执着己见而安顺于“命”，也即“与天和”。庄子认为，只有这样才能使君王“达之入于

无疵”，“彼且为婴儿，亦与之为婴儿。彼且为无町畦，亦与之为无町畦。彼且为无崖，亦与之为无崖。达之入于无疵。”⁶

其次，“与天和”者会对他人产生吸引力。《德充符》篇，庄子借孔子之口，道出了一个“与天和”者的品质和人格魅力。篇中的王骀“不知耳目之所宜，而游心于德之和”，此处之“德之和”无疑就是“与天和”。“与天和”之王骀，“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，命物之化而守其宗”，“物视其所一，而不见其所丧”，与他交往的人“与仲尼相若”，而且“虚而往，实而归”，孔子甚至“将引天下而与从之”。“与天和”使王骀产生了强大的人格魅力。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来吸引他人，如此的一种互动，就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障碍被消除了如此简单，它还是在“成己”基础上成就他人、人我一体、物我无别的其乐融融状态。从这层意义上讲，“与天和”不仅仅是一种心灵境界，在生存的意义之上，“与天和”也是心灵与万物、世界，乃至在命运的宛转中所透显出来的生命智慧与生存方式。“与天和”不仅“意味着对立双方的化解和销蚀，也就是说把理想与现实、物与我、彼与此、是与非、善与恶混融为一”⁷，它更是一种蜕变与升华，是理想对现实、心对于物的“拯救”，也是心灵在道境中的“逍遥”。

庄子将天下之“和”，即“人之和”希冀于人“与天和”，设想从个体主体的、内在的修养出发，去维系一个有序的世界，表明了庄子对以公共礼制与“圣人”价值维系天下和谐的怀疑，这种怀疑基于他对人类发展历史的洞察。庄子认识到，人企图主宰历史的思想动机与历史结局会产生偏离。庄子在《盗跖》《胠箧》《应帝王》等篇中都明确表达了这种洞见。“圣人”或者“礼制”或许是出于某些“正义”和“善”的动机，结果却引发“盗亦有道”的历史悖论。人类的文明往往意味着道德和人性的堕落。李振刚说：“‘圣人’



涂抹着历史,‘历史’包装着圣人,从此人性不再真实,道德不再真实,一部历史成为掩埋强者罪恶的坟墓,‘文明’成为粉饰人性狭隘、虚伪、残忍和软弱的遮羞布。”⁸同时,“与天和”作为“与人和”的基础,它蕴含着庄子的理性精神和将生命融入自然的价值取向。在人的自身方面,心无挂碍,包容旷达,人的生命才能长久,这是人之常情;在处世方面,当处于身不由己的危机中时,选择暂时安顺于时势是一种理性的选择。庄子认为“与天和”者能够“其生也天行,其死也物化”,这本身就体现了“天人合一”,即生命与自然世界相融合的价值取向。

| 人的自由

“庄子思想发源于对人的精神自由的追求”⁹,其哲学的根本旨趣在于实现对生命的超越,达到个体心灵的绝对自由,追求逍遥(自由)是庄子思想的核心。同样,作为庄子“和”之本质的“与天和”也体现了这一点。

首先,“与天和”意味着对人之生存困境的冲破与自由。“与天和”作为庄子之“和”的本质,表现出了对“命”的安顺,“其生也天行,其死也物化。静而与阴同德,动而与阳同波”。庄子之“命”对人来说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外在必然性,人只能去面对和安顺它。“命”与“性”相通,因为“性”是某事物之所以为某事物之规定者,它也是一种外在的必然性,两个概念时常并提,如“性不可易,命不可变”“性命之情”等。所以,一方面,“与天和”者能认知和遵循事物存在的必然规律,这是一种理性的精神,它有助于人在面对问题时,找出问题的症结和解决的方法,实现对人生困境的突破。如前文提到“与天和”是“与人和”的基础,之所以会如此,其中一点就是“与天和”所蕴含的理性精神,因为庄子确切地认识到,精神的各种负担纷扰是影响人生命质量的客观因素,时势险恶,个体弱小,以至于个体无

法干预时势,“与天和”就是对这些客观事实和规律的充分尊重。另一方面,“与天和”者是不失事物“性命之情”的体现,不失“性命之情”,人则“正(至)正”。庄子曰:“彼正(至)正者,不失性命之情”¹⁰,意味着人从外在必然性的束缚中解脱了出来,超越了内在的主观性力量,获得了精神的独立与自由,即“无天怨,无人非,无物累,无鬼责”。庄子曰:“恬与智交相养,而和理出其性。”¹¹“与天和”本质上是一种在理智、理性基础上的精神修养,它能形成一种“逍遥无待”的心灵境界。

其次,“与天和”是人心与“道”的相合。如前所述,“与天和”表现为人心合于“道”,而人心合于“道”本身就是人的自由。“与天和”还体现为虚静不与物迁,它们也是人心合于“道”的表现。就“与天和”之“虚静”来讲,它一方面是人心对内在欲望偏见的去除。庄子曰:“啮缺问道乎被衣,被衣曰:‘若正汝形,一汝视,天和将至;摄汝居,一汝度,神将来舍。德将为汝美,道将为汝居。汝瞳焉如新生之犢,而无求其故。’言未卒,啮缺睡寐。被衣大说,行歌而去之。曰:‘形若槁骸,心若死灰,真其实知,不以故自持。媒媒晦晦,无心而不可与谋。彼何人哉!’”¹²此处的“正汝形,一汝视”就是“形若槁骸,心若死灰,真其实知,不以故自持”,即对内在欲望偏见的去除。另一方面是人心对外在毁誉的摒弃。庄子曰:“介者搢画,外非誉也。胥靡登高而不惧,遗死生也。夫复习不愧而忘人,忘人,因以为天人矣!故敬之而不喜,侮之而不怒者,唯同乎天和者为然。”¹³“唯道集虚”,在排除内在欲望偏见以及外在毁誉干扰的情况下,人心可以对“道”做到无限的敞开,与“道”相冥合,实现精神的解放与心灵的自由。就“与天和”之“不与物迁”来讲,“不与物迁”实质上也就是“忘物”“外物”,而“外物”“忘物”则意味着能“见独”,见“独”则合“道”,即自由。陈鼓应先生说:“‘道’为绝对无待,因以‘独’来称它。”¹⁴徐复观先生说:“《庄子》一书,最重视

‘独’的概念，本亦自老子而来，老子对道的形容是‘独立而不改’，‘独立’即是在一般因果系列之上，不与他物相待，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意思。不过老子所说的是客观的‘道’，而庄子则指的是人见道后的精神境界……庄子之所谓‘独’是无对待的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；这种境界，有时候也称为‘天’。”¹⁵

再次，“与天和”意味着能齐同“物”与“知”。“与天和”者是明白于“天地之德”者，“天地之德”即生物之“德”，而天地以阴阳交通之和气而生物，故“与天和”者，即是领悟到“通下一气耳”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物与物之间、我与万物之间本质上就毫无差别，而执着于物我的大小、长短、高低、贵贱的差别就变得没有意义，这将产生“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”的博大包容气象。在这种气象的观照下，人能够坦然的直面生死，“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”。同时，“与天和”者是“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”。“圣人”即“真人”，即心合于“道”之人。“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”是“真人之心”在天道的指引下对生命个性与价值的包容，这即是“真人”之“真知”。“真知”之所以“真”，在于这类“知”是无边界、无成心、无偏私的。与世俗之“俗知”束于一隅不同，“真知”是对各类“知”

以及是非价值的齐同，是一种“通”于万事万物的境界。人在这种情况下，任何是非、美丑的价值分判均会变得苍白无力。褪去对各类物的区分，抛开对各种“知”的分判，人自能无拘无束、轻松自在。

从“与天和”的主体性、内在性来讲，庄子之“与天和”所关注的重点不在于现实的社会公共建制，而在于人自身的个性与自由。“与天和”所蕴含的自由精神，体现了庄子对现实历史的批判。至庄周所处的时代，华夏历史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经济上进一步发展，生产技术得到进一步提高；政治上礼崩乐坏、诸侯割据、战乱频繁。变法的推行在强盛了经济、军事的同时，汇聚了人才，促进了文化上的争鸣与繁荣。但是，在历史浪潮的深刻变化中，人的价值却越来越渺小，越来越工具化：普通民众在战乱中往往命如虫蚁，饥寒交迫，朝不保夕；贤才们穿梭于名利之场，辗转于权贵之间，蝇营狗苟，死而后已；君王们则为财货、疆域争战不已。这是历史的前进给庄子留下的真实影像。人不仅身心负着“天刑”，更背着“人刑”“物刑”，人类文明的发展蜕变成了箍紧人类自由的枷锁，它们刺痛着庄子的内心。“与天和”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的自由的张扬，正是对现实社会历史的批判。

（作者为安徽大学哲学系博士生）

注：

1. 葛荣晋：《中国哲学范畴通论》，北京：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728页。
- 2-6、10-13.（清）郭庆藩著，王孝鱼点校：《庄子集释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12年，第463、781-782、390、666、170、323、548、734、809页。
7. 郑开：《道家形而上学研究》，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231页。
8. 李振刚：《大生命视域下的庄子哲学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259页。
9. 崔大华：《庄学研究》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104页。
14. 陈鼓应：《庄子今注今译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185页。
15. 徐复观：《中国人性论史（先秦篇）》，上海：三联书店，2001年，第348页。